

「南朝梁」钟嵘 著

# 诗品

国学经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学经典

〔南朝梁〕钟嵘 著

# 诗品

张 朵 李进栓 注释

徐正英 审定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品/(南朝梁)钟嵘著;张朵,李进栓注译.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6

(国学经典)

ISBN 978-7-5348-3235-2

I. 诗… II. ①钟… ②张… ③李…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理论-中国②诗品-注释③诗品-译文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8143号

---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21.25

**字数:**260千字      **印数:**1-5000册

**版次:**2010年6月第1版      **印次:**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

**定价:**3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 诗 品



## 梁书·钟嵘传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晋侍中雅七世孙也。父蹈，齐中军参军。

嵘与兄岍、弟屿并好学，有思理。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明《周易》，卫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举本州秀才。起家王国侍郎，迁抚军行参军，出为安国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参军。天监初，制度虽革，而日不暇给，嵘乃言曰：“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纓组，尚为臧获之事，职唯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谓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侥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谨竭愚忠，不恤众口。”敕付尚书行之。迁中军临川王行参军。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时居士何胤筑室若邪山，山发洪水，漂拔树石，此室独存。元简命嵘作《瑞室颂》以旌表之，辞甚典丽。选西中郎晋安王记室。

嵘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其序曰：……（即《诗品序》，略）顷之，卒官。

（中华书局点校本《梁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钟嵘传》）

## 南史·钟嵘传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晋侍中雅七世孙也。父蹈，齐中军参军。

嵘与兄岍、弟屿并好学，有思理。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明《周易》。卫将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建武初，为南康王侍郎。时齐明帝躬亲细务，纲目亦密，于是郡县及六署九府常行职事，莫不争自启闻，取决诏敕。文武勋旧皆不归选部，于是凭势互相通进，人君之务，粗为繁密。嵘乃上书言：“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书奏，上不悻，谓太中大夫顾暭曰：“钟嵘何人，欲断朕机务，卿识之不？”答曰：“嵘虽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职事，各有司存，今人主总而亲之，是人主愈劳而人臣愈逸，所谓代庖人宰而为大匠斫也。”上不顾而他言。

永元末，除司徒行参军。梁天监初，制度虽革，而未能尽改前弊，嵘上言曰：“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纓组，尚为臧获之事，职虽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谓永元诸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浇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

应在绥抚，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敕付尚书行之。

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时居士何胤筑室若邪山，山发洪水，漂拔树石，此室独存。元简令嵘作《瑞室颂》以旌表之，辞甚典丽。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

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爰文，王元长等皆宗附约。于时谢朓未遁，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密于范，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顷之卒官。

（中华书局点校本《南史》卷七十二列传第六十二《文学·钟嵘传》）



# 钟嵘《诗品》（代前言）

王运熙

## 一、绪 说

钟嵘《诗品》是现存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它对汉魏至南朝齐、梁时代的五言诗作了系统的论述，很多精辟的见解，对后代的诗论产生较大的影响。《诗品》和《文心雕龙》常常被人们相提并论，被称为南朝文学理论批评的两大专门著作。清代章学诚从史学家的立场，曾对《诗品》作了很高的评价：

《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勤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论诗论文而知溯流别，则可以探源经籍，而进窥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矣。此意非后世诗话家流所能喻也。（《文史通义·诗话篇》）

钟嵘（约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活于齐梁时代。齐时官至司徒行参军，梁时官至西中郎晋安王记室。《梁书》本传说他卒官于西中郎晋安王记室，考《梁书·简文帝纪》，简文（萧纲）于天监五年封为晋安王，天监十七年征为西中郎将，领石头戍军事，不久改官。因此推定钟嵘卒于天监十七年（518），是

较为可信的。又本传称其书为《诗评》，《隋书·经籍志》：“《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可见在隋代，此书已有二称，但到了后代，只流行《诗品》一名了。

《诗品》的写成在什么年代呢？《诗品序》称梁武帝为“方今皇帝”，可知此书撰于梁武帝时。又说“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说明此书所评述的没有活着的作家。沈约卒于天监十二年（513），则此书的撰成，当在天监十二年以后了。

《诗品序》有一段文字详细叙述写作《诗品》的宗旨和背景，文云：

今之士俗，斯风（指写诗）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听，无涉于文流矣。观王公搢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

序中指出当时士人写作五言诗的风气很盛，但是各人的嗜好不同，意见纷歧，没有准则。一些“轻薄之徒”，见识卑下，以鲍照、谢朓为古今独步，学习他们，也只得其皮毛；而轻视曹植、刘桢，笑为古拙。《诗品》的写作，目的就在通过对诗人的品评，树立良好的准则，对诗歌创作发生指导作用。在这方面，钟嵘的意图和刘勰写《文心雕龙》的意图，有其相似之处。

钟嵘对当日“庸音杂体，各各为容”的诗风，深表不满，同时

他认为过去的文论，没有对作家、作品进行品评，失去了文学批评对创作的指导作用。他在《诗品序》中列举陆机、李允、王微、颜延之、挚虞数家的著作，指出他们都是“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而像谢灵运所编的《诗集》，张鹭所撰的《文士传》，以及“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在这里显示出钟嵘在文学批评思想方面的发展。因此《诗品》跟过去的文论有很大不同，它是要“辨彰清浊，掩疵利病”，也就是显优劣，列品第。书名《诗评》或《诗品》，即体现了写作这书的宗旨。

《诗品》评述了自汉魏至齐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一卷。这种分品论人的做法，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古代的文化学术传统，另一方面是时代风气。在古代的文化学术传统方面，如《诗品序》所指出，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分九品论人；而刘歆的《七略》，也是分流派来叙述过去的学术的。在时代风气方面，自汉末清谈盛行，曹魏设立九品中正制度，自此以迄南朝，形成了一种喜欢品第人物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的影响及于文学艺术的领域。曹丕的《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已经评鹭了建安七子的优劣。到齐梁时代，这种风气更盛。南齐谢赫有《古画品录》，分画家为六品。梁庾肩吾有《书品论》，分书法家为九品。沈约有《棋品》，因仅存序文，分品不详。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钟嵘自然会不满意过去大部分文论的“不显优劣”、“曾无品第”，而要写“辨彰清浊，掩疵利病”的《诗品》了。

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创作比过去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在诗歌方面，产生了许多风格不同的作家和作品，大大地开拓了诗歌的园地，这对于《诗品》的写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时文学理论批评也大大发展，除许多单篇论文外，还有若干专门著作。在《诗品》以前，诗论方面的专著见于记载的，有刘宋颜竣的《诗例录》二卷，见于新旧《唐书》。又《南齐书·文学传论》称“张际摘句褒贬”，

当是后世诗句图一类的著作。可惜两书都没有流传下来。

《诗品》三卷，分三品论述历代诗人创作的特色和渊源流变。正文对许多诗人分别作了具体分析。序文则是全书的总论，提出了一些对于诗歌比较原则性的看法，并对于当代的不良诗风进行了批评。两部分的内容互相配合，议论互相印证。下面为了叙述方便，分别介绍序文和正文的主要论点。

## 二、论五言诗的思想艺术标准和历史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五言诗的发展时代，在这历史时期中，五言诗不但作家作品众多，而且也产生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当时一部分文论，拘于《诗经》是四言体的成见，仍然重四言轻五言。如挚虞《文章流别志论》说：“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五言者，于俳谐倡乐多用之。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文有节录）表现了很保守的正统观点。《文心雕龙·明诗篇》虽然以五言诗为主要论述对象，但仍然说：“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所谓“正体”、“流调”，仍不免有雅俗之分。《诗品序》与此不同，从正面明确地肯定了五言诗的艺术表现能力高于四言诗：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梁时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有云：“五言之制，独秀众品。”钟嵘、萧子显的议论，都表现出能够正视诗歌形式发展的历史事实而不为儒家经典所束缚的进步观点。

**论诗歌产生的根源** 《诗品序》一开头就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指出诗歌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的性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感召和激动。后面又对这个问题作了具体的阐述：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官；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

这里说明变化不居的自然景物和不同寻常的社会生活，使身临其境的人们，产生了激动的感情，不能不形诸吟咏，从而产生“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这段话直接是讲诗歌产生的缘起及其作用，实际上也反映了对诗歌内容的看法和要求。钟嵘认为，诗歌内容只有表现了人们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所激发的思想感情，才能够产生“可群可怨”的艺术感染力量。这种认识跟《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说的“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一段话的意见是比较接近的。《诗品》本论对一些具体作家的评论，很多是从这一方面来衡量的。

《诗品序》论诗的艺术性道：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蹶；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钟嵘要求诗歌在艺术上以风力为骨干，以丹彩为润色。所谓“风力”，就是《文心雕龙》所谓的风骨。指作品思想感情表现明朗和语言质素有力。“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就是《文心雕龙·风骨篇》要求风骨与文采互相结合的意思。二者结合，使作品能够达到文

质彬彬，形成优美的风格。在表现手法方面，钟嵘主张赋、比、兴三者交错运用，使表现的文意，不过深过浮，恰到好处，使读者既不感到难以理会，也不感到一览无余。

《诗品序》非常重视自然之美，对于宋齐时代不少诗人喜欢用典的风气，深表不满：

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诂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

钟嵘认为，“经国文符”、“撰德驳奏”一类文章，应该援引古典；至于“吟咏情性”的诗歌，其优秀的篇什都是描写目击身历的景象，不需用典，因而提倡“直寻”和“自然英旨”。在当时“竞须新事”、“寝以成俗”的风气中，这种意见具有积极意义。

基于提倡自然之美，钟嵘还反对齐梁时代风靡一时的声律论。他认为由于王融、谢朓、沈约等提倡声病，使诗歌创作受到影响，“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他对于当日这种追求声律、流于形式的不良风气，进行了批评。他主张一般诗歌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四声八病之说为诗歌制订了严密的规律，作者们在写作过程中受到拘束，或者是“专相凌架”，片面追求，因而造成“伤其真美”的弊病，钟嵘对这种倾向的批评，是有其意义的；但钟嵘对声律本身在诗歌艺术上的贡献认识不足，因此在这方面表现出偏激的态度。

论五言诗的历史发展 《诗品序》论述五言诗的起源和汉代五言诗的作家作品道：

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诗人之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质木无文。

摘取先秦诗歌中的个别五言句来说明五言诗的滥觞，是当时文论家的共同做法，《文章流别志论》、《文心雕龙·明诗篇》都有类似情况。西汉诗人作品，真伪如何，当时传闻异词。关于枚乘、李陵、苏武、班婕妤诸人的诗作，颜延之《庭诰》、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徐陵《玉台新咏》诸书的题署，各自有所不同。《诗品》首列李陵、班姬两家，而不及枚乘、苏武，也是一种看法。

从建安时代开始，文人五言诗大大发展，《诗品序》对建安到刘宋五言诗的发展过程，作了很具体的评述：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

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在这段历史过程中，钟嵘指出建安、太康、元嘉三个时期的诗歌成就，并以曹植、陆机和谢灵运等人为杰出领袖。在我们今天看来，他对陆机的评价偏高，于晋宋之际，不举陶渊明，都是显著的缺点。但他在这里，强调了建安风力，批判了玄言诗的虚谈，并指出郭璞、刘琨的不同艺术成就，都是可取的。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在评述历代诗歌发展时，也特别重视建安时期的曹植、王粲，元康（惠帝年号，稍后于武帝太康年号）时期的潘岳、陆机和刘宋初年的谢灵运、颜延之这些诗人。萧统《文选》于曹植、陆机、谢灵运三人，选录诗歌也特别多（曹植十六题二十五首，陆机十九题五十二首，谢灵运三十二题三十九首），数量远过其他诗人。由此可见，《诗品》所特别推重的诗人，在当时可说已有定评，因此批评家、选家的意见也颇一致。《宋书·谢灵运传论》更赞美建安曹氏父子作品的特色是“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即情文并茂、文质兼备，这种衡量诗歌的标准和钟嵘的意见也是接近的。

建安以后、太康以前的曹魏时代，诗歌一度比较衰落，《诗品》称为“陵迟衰微”。这时期玄学抬头，对诗歌发生不良影响。《文心雕龙·明诗篇》称为：“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西晋末年到整个东晋时代，玄言诗盛行，诗风更为不振。《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心雕龙》（《明诗》、《时序》）都致不满，《诗品》讥为“建安风力尽矣”，所见也同。《诗品序》在这段诗歌发展过程的评述中，对作家作品所作的肯定和批判，并不是钟嵘一人的私见，在当时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诗品序》虽然批判了玄言诗风，但它更为着重指责的，乃是刘宋颜延之、谢庄开启的诗歌大量用典之风和齐梁时代的声律论，那是因为从刘宋初年谢灵运等诗人出来以后，玄言诗已趋于衰颓；而数典用事和讲求声病，却是齐梁时代诗歌创作的流行风气，钟嵘感到有矫正时弊的必要，就不免对后二者更



加要大声谴责了。

### 三、论五言诗作家及其流派

《诗品》三卷，共评论自汉至梁的一百二十二位五言诗人，分成上中下三品，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通过对于这些作家的评论，钟嵘表现了对诗歌的一些重要看法，并且论述了作家间的渊源继承关系，指出了五言诗歌史上的若干重要流派。

**情兼雅怨和生活遭遇** 钟嵘于历代诗人中最推崇曹植，给他以极高的评价。说他的作品“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论其思想、艺术的成就是：“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概括起来讲，在内容上是情兼雅怨，在形式和风格上是骨气和文采相结合，而达到了文质彬彬的境界。钟嵘对于曹植诗歌的这个评语，正体现了他对于诗歌思想、艺术的要求，这个要求跟《诗品序》的观点也是完全符合的。

钟嵘很重视诗歌中所表现的感慨、哀怨的情思，这种情思正是封建社会诗人们，在政治环境和生活境遇中受到了压制和打击，而发泄出来的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司马迁云“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正是这种情思的说明。钟嵘评《古诗》云：“意悲而远”，“多哀怨”。评李陵云：“文多凄怆，怨者之流。”评班姬云：“怨深文绮。”评王粲云：“发愀怆之词。”评阮籍云：“颇多感慨之词。”评左思云：“文典以怨。”评秦嘉、徐淑云：“文亦凄怨。”评刘琨云：“多感恨之词。”在这些具体的评述中，使我们体会到：他所说的这种“哀怨”、“愀怆”、“感慨”、“感恨”之情，是与政治现实和生活境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正因为诗歌能表现这种思想感情，所以才具有“感荡心灵”的力量。

钟嵘又很重视诗歌风格的典雅。评阮籍云：“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评应璩云：“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